

基,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世界。

(王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译审)

国外中国学的流变、现状与思考

周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中国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为主研究中国问题的综合性学科。其概念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形成了汉学、国外汉学、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世界中国学等若干意思相近又有不同内涵的相关术语。其中,汉学(Sinology)专指海外偏重于历史人文领域的中国研究,或特指古代中国研究。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海外中国学或国外中国学,则主要是中国境外或国外以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为主要对象的综合性研究,即观照当代中国、现实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学”源于“汉学”,但又有别于“汉学”。严绍璁指出:“我国学术界目前在关于 Sinology、Chinese Studies 等的译名和关于这一学术的名称的认定方面,认识上的差距很大。”^①而世界中国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试图推动建立的一门新兴学科的称谓”^②,是国内常用于对带有“海外”“国外”“国际”等各种地域限定词的中国研究的统一称谓,涵盖中国本土和国外两方面的中国研究。本文以国外关于古代中国和现当代中国研究的机构、成果为研究对象,阐释其由古及今的流变过程,分析其现状与特点,针对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应对的思考,以推动构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国外中国学的演进与格局形塑

国外中国学(汉学)自利玛窦开始,经数百年的发展,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在区域格局等方面都经历了深刻的演进过程。

(一) 国外中国学研究对象的分野

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外中国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日益丰富、拓展,主要可分为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前者又称为汉学研究。

1. 汉学。从西方以欧洲汉学为代表的传统汉学的演进历程来看,其大致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早期一鳞半爪的游记内容,到传教士严肃的探索,再到专业中国学者或汉学家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的系统研究,汉学主要关注中国古代历史和古典文献研究。这三个不同阶段清晰地折射出了汉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传承和演变脉络。随着古代中国地理疆域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开始有西方人套用对古罗马帝国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封建王朝使用“中华帝国”的称谓。因此,西方早期关于中国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原”和封建时期的“中华帝国”概念,亦多统称为汉学。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将古代中国出现过的统一大朝代划分为三个“中华帝国”时期。^③当然,这种以统一的大朝代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汉学本身而言,中原文化依然是西方研究的内核,但由于当时中国北部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民族之间的交流、民族文化的交融,这种激荡和变化不可小觑,更不应被忽视、被剥离。

2. 中国学。晚清以降,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开国门,西方汉学的研究视野开始超出汉学和古代“中华帝国”的范畴,在东亚朝贡体系和东西方冲突对抗的框架下研究中国。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

^①严绍璁:《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国际汉学》2000年第5期。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3页。

^③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1、105、177页。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的发生以及区域研究的兴起,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以研究现当代中国为目的、以美国学界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学就在这种“敌情研究”需要的基础上逐渐兴盛并成为主流。在传统汉学向现当代中国学演变的过程中,费正清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突破传统汉学的束缚,改变过去汉学研究重历史、轻当代,重西方观点、轻中国事实,重人文科学、轻社会科学的状况,撰写了《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大量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述,建立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确立了当代中国学的学术标准。^①

总的来看,由于中国地理疆域的不断扩大、历史时限的不断下延以及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中国学的研究视野基本遵循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演变,其研究范畴也日益将“传统中国”与“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中国文化”与“中国价值”融为一体。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国际地位的日益突出和世界格局的加速演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中国学日益成为当代国际“显学”,成为一种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的综合性基础研究。

(二) 国外中国学研究方法

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因其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多采用历史学科、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区域研究的框架内探讨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

1. 历史学研究方法。国外中国学的基础和核心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国外中国学最基本的方法。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提出的基于历史研究的“宋史研究计划”,得到了汉学家的普遍支持,而且这一计划不再把古代中国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而是作为中华文明整体的一部分去研究。^②此外,文献是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国外中国学学者往往通过中文典籍以及外文译介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国外中国学研究很早就注重对中国资料的汇编,如费正清和邓嗣禹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费正清和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基础。

2. 比较研究方法。国外中国学,是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因此运用比较的方法是必需也是必然的,而且往往是贯穿始终的。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文化形成了其独有的发展体系,塑造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相异性,从而推动中国研究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异同性的比较研究。即使在中国文明蒙尘的近现代社会,仍有不少西方学者和政界精英认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③汤因比在分析世界历史各主要古文明的兴起和衰落后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的所需的干练才能……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④

3. 跨学科方法。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涉及中国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任何单一的学科研究方法都难以孤立地穷尽其全部,因此需要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正如芮玛丽所言:“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认为长期致力于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域研究是合理的,尽管它是世界上最大也最为丰富多彩的地区。”^⑤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国外中国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加之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使新兴理论方法更深切地导入中国研究领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三) 国外中国学区域格局的形塑

国外中国学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从以欧洲为中心向以美国为中心,再向亚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

^①王战、褚艳红:《世界中国学概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14—15页。

^②张西平等:《70年来的中国发展与海外中国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③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6页。

^④池田大作、阿·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284页。

^⑤Mary C. Wright,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Voc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ug., 1964.

辐射的发展趋向。至少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学研究机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总数已超过 1000 个,遍及世界各地。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的总数不少于 1 万人,而且近年还在不断扩大。^①

1. 欧洲中国学。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汉学研究发源地和勃兴地。最具代表性的国际汉学组织——欧洲汉学学会,成立于 1975 年,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学术研究机构。其他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主要有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巴黎汉学研究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洪堡大学汉学所、汉堡大学汉学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中国研究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汉学系,波兰华沙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等等;相关学术刊物主要有英国的《中国季刊》,法国的《法国汉学》,德国的《亚洲研究》《当代中国》等。

2. 美国及加拿大中国学。美国中国学呈现出从欧洲汉学的传统语文学研究模式转向以社会科学方法为主的研究模式,从单纯的学术探索转向公开为美国、西方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的特点;在学术代际传承中,出现了以费正清为代表,聚焦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第一代汉学家,以施坚雅和魏斐德为代表,聚焦社会史研究的第二代汉学家,以及以裴宜理为代表,聚焦反帝史、民众运动史、地方史研究的第三代汉学家。^②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机构开始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正如埃德加·斯诺曾对毛泽东所言:“当你在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的同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国学’的命。”^③ 自此,美国中国学在中国知识教育、汉语教育、中国研究机构及服务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跃进式发展。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大概有 3000 人研究中国问题……美国情报部门一向关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现在都有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心或者项目,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这个研究领域。”^④ 美国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有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等;相关学术刊物主要有《近代中国》《当代中国》《中国经济评论》《中国政治研究》等。就研究范式而言,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盛行着三种主流范式,即“帝国主义”范式、“传统—近代”范式、“冲击—回应”范式。此外,受欧洲和美国中国学的影响,加拿大一些中国学研究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如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聚焦当代中国相关时事和政策的跨学科研究。

3. 俄罗斯中国学。俄罗斯研究中国的方法主要是,基于自身的中国观、对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追求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专注于对中国第一手文献开展独立研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俄罗斯的中国研究中较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改革经验的研究,如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应对世界风险挑战、创建自由经济区的实践、参与世界贸易和全球化的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俄罗斯代表性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主要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国立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等;相关学术刊物主要有《远东问题》《东方》等。

4. 亚洲中国学。亚洲中国学主要以日本、新加坡和印度等国的研究为代表。在东亚,作为第一个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对华野心日益加剧。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较早出现运用社会学理论开展研究的倾向,提倡结合法律等专门知识和方法论以研究汉籍,同时着手开展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包括地理、兵制和经济、政治现状等方面内容^⑤,如组建“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为其侵略战争服务^⑥。

①张西平等:《70 年来的中国发展与海外中国研究》。

②张西平等:《70 年来的中国发展与海外中国研究》。

③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伍协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208 页。

④梁怡、王爱云:《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⑤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87、223 页。

⑥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598 页。

日本战败后,开始设立一般社团法人如中国研究所等机构,专门研究现代中国以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领域问题。成立于1949年的日本中国学会是以中国相关学术研究为目的,以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综合学会。此外,日本还成立了日本现代中国研究学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推动中国研究和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在韩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韩国中国学会、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汉城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等。由于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甚至彼此的语言有某些相似点,亚洲各国开展对中国研究具有更多的优越条件。^①除了日本、韩国外,亚洲其他国家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主要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新加坡中国学会、新加坡儒学研究会,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等;相关刊物主要有新加坡的《亚洲文化》《中国:国际期刊》,印度的《中国报道》等。

5.大洋洲中国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传统汉学研究较为薄弱,主要是从英国等欧洲国家引入汉学家。中澳建交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重视汉语教学,在高校中开设丰富多样的亚洲语言课程,越来越多的学生选修中文课程或学习汉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有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亚洲研究所等。

6.非洲中国学。相对而言,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研究起步晚、发展慢。1980年代以前,其中国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随着非洲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中非关系的深化,非洲对中国研究从中国反帝反侵略斗争的成就逐渐转向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成就、中非关系等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深化,非洲中国学进入了跨越式发展时期。目前,非洲中国学的研究机构有智库、高校和科研机构三大类型,遍布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苏丹、博茨瓦纳等国家。^②

7.拉丁美洲中国学。拉丁美洲中国学以墨西哥中国学最为典型。墨西哥中国学的学院化研究肇始于1964年,以墨西哥学院东方研究系的建立为标志,后更名为亚非研究中心。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是拉美大陆最早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机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学术出版物《亚非研究》与《亚太年鉴》为平台,其研究内容以古代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及中拉关系为主。该中心还形成了一批中国学学术中坚力量,为墨西哥及拉美大陆培养了大量中国学研究人才。^③

二、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与国际地位的大幅跃升,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21世纪以来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一是国外中国学研究日益呈现“世界化”趋势。过去,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以英、法、俄、美等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和日、韩等中国周边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原本起步较晚的一些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对中国学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中国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化”趋势。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美、英、法、德、日、俄等国学者依然是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力量。

二是国外中国学新生代学者群体正在崛起,华裔学人成为其中的重要生力军。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新生代学者中,不少人曾在中国留学或访学,接受过中国文化教育的熏陶、浸染,亲历、亲见中国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对中国的理解带有某种程度上更深的感性或直观认知。此外,旅居海外的华人和华侨在研究当

^①黄长著:《国外中国学与亚洲中国学》,《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②黄畅:《发展中的非洲中国学:脉络、议题与特点》,《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③王晓阳:《墨西哥学院的中国学研究》,《国际汉学》2022年第1期。

代中国问题的学者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日渐成为一股重要生力军。正如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所观察到的现象,21世纪以来,美国不少大学东亚系的华裔教授所占比例越来越高。^①这反映了国外中国学日渐倚重东方学者的新趋势。^②

三是国外中国学的研究重心日益聚焦于当代中国。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及其对世界影响的与日俱增,使得国外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的关注蔚然成风。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大大超越对传统中国的兴趣,当代中国成为无可争议的研究重心。如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成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当下热点。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而深刻。

三、国外中国学存在的问题、挑战与应对路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外中国学受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及方法和学者所在国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等因素的影响,存有诸多局限与不足,如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他者”视角的文化隔膜,造成对中国的认知偏差;中国学研究综合性、整体性意识的缺失,使其难以对中国有更为全面、准确而理性的认识与理解;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使中国学研究成为西方学者宣扬其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批评或道德评判的工具。因此,正如澳大利亚“中国通”陆克文一直极力倡导的,国外中国学需要“打破过去很多年来所形成的各个专科之间的人为的壁垒和藩篱”,形成中国学研究“更大的全局观”。^③面对国外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有学者尖锐指出:“在西方,中国研究濒临死亡。”^④

作为中国学的研究本体,我们需要整合各方力量,加强对国外中国学的追踪,全面、系统地了解其发展新动向、新思潮、新热点和新成果,既不能人云亦云、盲目推崇,亦不可假反思之名加以排斥、抵制,而应以平等、审慎的心态,在强化本土意识、本土立场的基础上辩证吸收、交流互鉴,坚定以中国为主体的研究立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中国学知识体系。

一是全面、系统地了解国外中国学,保持跨文化比较的理论清醒。近代以来,西方的近代化进程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西学冲击。所以,我们一定要运用好唯物史观这一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不仅要反思和抵制关于近代西方文明“优越性”和“普适性”的价值认知,也要全面了解国外中国学的成果,在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基础上发掘共通性价值,在开放性对外沟通的同时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性知识生产链,强化“中国学正逐渐回到中国”^⑤的趋向,引领中国学的全球发展,真正实现“中国学回归本土”。

二是审慎看待国外中国学,坚定历史自信和学术自信。在审慎看待国外中国学成果时,我们要防止落入西方的“理论陷阱”“话语陷阱”,科学、理性地回应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汤因比之问、彭慕兰之问、李约瑟之问、福山之问等问题,驳斥“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破除“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坚定历史自信,将中国学研究的中外话语对话落实到具体研究议题和文本分析中,避免滥用西方新式理论或不自觉的文化思维偏见。

三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遵循中国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广泛深入地组织国际论坛和研修交流项目,邀请更多的国外中国学学者来中国参观访问和交流合作;在“智库”层面,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开展合作和国际交流;在学术交流方面,就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改革经验、中国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等议题,加大与国外中国学机构合作

①吴原元:《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学呈现新趋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2日。

②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书屋》2007年第12期。

③陆克文:《新汉学,让世界读懂“学术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15日。

④郑永年:《在西方,中国研究濒临死亡》, https://view.inews.qq.com/k/20210813A04E16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autoopenapp=ampzkqw。

⑤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

研究的力度,主动译介、推出更多中国研究需要的文献资料,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融合发展方面推出更多更易被世界广为接受的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为我们科学、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口。面对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常常呈现的雾里看花和隔靴搔痒的观感,及其囿于自身意识形态和固有文化思维惯性的影响而产生的误读或曲解,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历史自信和学术自信,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增进国际交流互鉴,不断引导“中国学回归本土”,推动新时代中国学的发展与繁荣。

(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The Historical Deposi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tudies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SONG Yue-hong

Chairman's words: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splendid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hina, New China has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development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entered an irreversible historical process, so Chinese studies have als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rominent learning”.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especially the philosophy of national history, endows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tudies with new era connotations and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w era is to interpret Chinese practice and construct Chines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 and China's development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base ourselves on China, lea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explore history, grasp contemporary tim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and truly, stereoscop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howcase China and the trustworthy, lovely, and respectable image of China.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tudies, we have planned and organized this group of thematic discussions together with Hebei Academic Journal, with the aim of l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tudies in depth.

Key Words: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w era; Chinese studies; research on national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赵新潮]